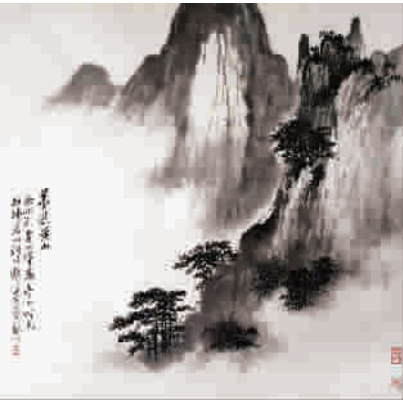




▲ 江寒汀绘《梦游黄山》

清明时节，思念先人、祭奠先人的同时，心中难免想得也比较多，一旦内心的想法多了夜里难免做梦。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们全家漫步于黄山之上,悠然地欣赏着那奇松怪

梦游黄山 ◆ 张 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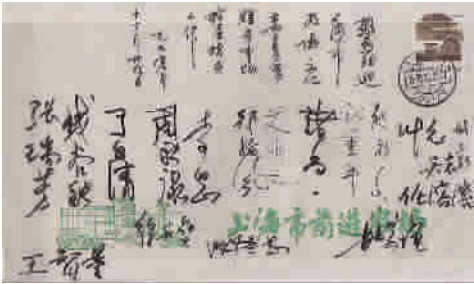
石、温泉云海,谈笑之间我们已然到达山顶。突然之间画面转换,眼前出现一座凉亭,亭中一位穿着长衫的老人正手持毛笔画着什么。出于好奇,我走向那位老人,想一探究竟,探头一看,一幅非常熟悉的山水画出现在眼前,画面正是黄山之景。抬头看向作画的老人,他也正对着我,心中突然一颤,那苍劲的脸颊,慈祥的双眸,笔挺的身形,不正是我只在照片和画像上才见过的外公吗?他口唇微动,仿佛对我诉说着什么,又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惊喜之余,我转身跑向身后不远的父亲与母亲,想告知他们外公正在这里的消息,但是模糊之间父母的轮廓仿佛和山顶的云雾融合,在不远处渐渐地消散了,内心着急之际,我回头再次望向外公所在的凉亭,那里也已经空无一人。就在这时,眼前一亮,梦醒了……

起床后,我在客厅坐了很久,看着侧首边挂着的,正是梦中所见到的外公所画的那幅画。突然想起不久前,母亲正和好友谈起这幅画,母亲说这幅画是外公 1962 年春天,也就是外公去世前的一年画的,外公的一生奉献艺术,十分操劳,终此一生也未去过黄山,心里一直十分的遗憾,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凭着自己夜里的一个梦和梦中所见,便画出了这幅画,犹如亲临黄山,实在令人钦佩。母亲说后来外公曾拿着这张画和好友开玩笑说在梦中了却了未曾去过黄山的遗憾。

说来也巧,52 年后的春天,我竟然和外公一样,做了同一个梦。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穿越,正是对先人的思念之情,才让我在梦中见到了一直以来向往,却未曾一见的外公,了却自己一直以来的遗憾。

一枚作家题签的纪念封 ◆ 袁 先 安

凡上了年纪的人都欢喜怀旧,需要怀旧。它是充满温情的往事流连,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过往的温暖记忆,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之中久久回荡。然而怀旧,需要触景生情,也需要心灵的契机。日前,我在由复旦和同济两所大学主编的《海派文化》报上看到一篇追思曾闻名遐迩的老报人、资深作家徐开奎的文章,方才得知两年前徐老已走了。记得他生前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生命如同一支蜡烛,要燃得有点价值,才不枉此生。”今天,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生动写照,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 1990 年 11 月 29 日那个难忘的日子来,笔者也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还曾相处过两天的一段往事,今天,我仍隐隐约约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谦谦君子风范长留在我的心中。24 年前的那一天,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老师率领市政协文化委员会一行十六人,专程来到地处崇明岛的前进农场,调研和指导农村文化工作,其中同来的就有徐开奎等多名上海著名作家。作为时任农场集邮协会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的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和调研活动,和文委成员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距今虽已时隔 20 多年,当时的情



景仿佛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

这次同来的文委成员中,几乎全是上海文艺界有声望的作家,其中就有文艺理论大家钱谷融,把安徒生介绍到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老报人、资深作家徐开奎,《解放日报》评论员,戏剧和杂文作家郑拾风,电影剧作家,先后创作了《伟大的起点》《护士日记》等近 20 部电影剧本的艾明之,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辞海》编委赵书文,代表作电影为《鸦片战争》《林则徐》的编剧作家叶元,专门从事研究儿童文学和科普创作,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吴岩等文艺界著名人士。这么多的上海名作家齐聚在一起,为繁荣群众文化工作献计献策而下农村,走基层已实属不易,其精神难能可贵,更为他们年高德劭又



热情而深深感动。

通过短暂两天的考察指导,这些名作家与群众广泛接触交流,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拉近了普通老百姓同社会著名人士之间的感情,深受人们喜爱。市政协文化委员会的视察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对农场举办的艺术节中集邮展览、家庭演唱会、班组演唱会和手工艺品展示等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临别之际,市政协领导和文委成员热情地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并在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纪念封上一一留下了他们的签名。令人惋惜的是,当年来者中徐开奎和郑拾风老师已驾鹤西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合影和签名封留有他们的音容墨宝,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份见证这段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纪念品,我将永远把它珍藏。

古玩市场,常见的范器为匏器。偶亦可遇桔皮、柚壳、革囊范制的器具。匏桔柚之器都是将雕刻好各种纹饰的范模,套扣于还在枝头生长的果实外。待果实在模中长大,成熟膨胀后,将外模拆御,果壳外部就自然长成了模套内设制的纹饰。而范革与前者虽有异曲同工之妙,却也略有不同。范革之器均为小器,以家畜和哺乳动物的皮革所制,但并非所有部位的表皮均可范制。

古人范模革器,先将猎杀或屠宰动物某些部位的皮囊内物掏清,然后在囊皮中填实沙土。因囊皮柔韧能伸缩,有张力可塑性强,范合上呈两半的模套并箍紧且将填口塞密。经若干日,待革皮干燥定形后,皮囊上就印烙下模具内工匠预刻的纹饰。拆模和清除囊器中沙土,再将成形革器进行硝革、染色、打磨抛光等工艺处理后,即成为一款光泽、器形、纹饰皆佳的范革小囊器。此类囊器因制作繁缛,且囊革较薄易破裂,故存世稀少。

我藏有一只动物囊革范制,色棕褐,高 8.2 厘米,囊肚宽 7 厘米的旱烟盒。盒呈弧底、鼓腹、溜肩、直颈、檐口、坛罐状(见图示)。此物应为晚清某湘人之爱。该旱烟囊底纹为莲花,意廉洁;囊肩及盖沿范牡丹,意高贵;囊身范一树虬枝展招的青松,意清直;三纹合一,巧喻为人为吏清廉为贵。令人玩味的是,囊腹中部范凸一羽大雁,古时传说鸿雁有传递书信之能。而囊盖顶部范显一骑四蹄凌腾,鬃毛飞扬的骏马,马上负一束锦羽,负与赴、锦与京同音。囊盒上的雁马纹隐喻着鸿雁传诏,马上赴京之意。

近代湖南兴举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孕育出如曾国藩、左宗棠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等一大批湘籍名人。民间亦流传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及“无湘不成军”等俚语。晚清外侮内乱纷纷,战事频频。莫不是这位怀有爱国之心,曾为官一方或怀才不遇的三湘旱烟盒主,以物寄志,翘首鹤望着朝廷的召唤,出将入帅,戍边安邦,以圆心中的拳拳报国梦。



藏友龙先生最近从美国古董市场上购买到一款老上海银碗。银器高 4.25 厘米,口径 7.5 厘米,重约 510 克。腹部一侧刻有英文字“Presented to Mr. & Mrs. R.P. Newell with best wishes of the Compradore Staff National City Bank,Shanghai, March 1939.”银碗内部全体鎏金,外部浮雕梅花,底部铭刻“HUNG-CHONG,合兴”。银碗浮雕逼真细腻,保存完好,让人爱不释手。

龙先生之所以在众多拍卖品当中选择了这款银器,主要是因为此银器腹部有“shanghai”字样。但这款银器与上海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龙先生收藏的这款银器属于老上海著名的外销银器。中国瓷器很早就销售国外,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历史。中国银器也是中国外销商品之一,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中国银器在古代就开始外销,但数量比较少。近代以来,中国外销银器逐渐增加。广州是近代银器对外销售最早最发达的地区。早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市的洋行街就有成片的外销银器作坊。不仅在广州的外国人喜欢到广州银器作坊购买银器,在广州的外国洋行还大批向广州银器作坊定做银器回国销售。关于广州银器外销情况,中外学者早有研究成果问世。广东省对近代广州外销银器的历史给予足够重视,在 2010 年广东省博物馆基本陈列中,有一展示单元专门展示广州外销银器。

上海是中国继广州之后的另外一个外销银器发达的地区。最初向外国人销售银器的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洋货号”。如“联和”、“鸿昌”、“德祥”、“长盛”等。这些洋货号多为北上的广东人在上海开设,销售

多种物品,金银器只是其中之一。1900 年左右,向外国人销售金银器皿的这批洋货号多数演变为“西洋首饰店”或“外国首饰店”“洋装首饰店”,专门针对外国客户或喜欢西式生活的中国人制造、销售西式金银珠宝。此外,江浙人或者本地人在上海经营的一些银楼也开始把外国客户作为重点销售对象予以关注。

龙先生手中的这款银器底部所刻“HUNG CHONG,合兴”是指银碗的制作作坊和销售公司。“合兴”为银碗的制作作坊名字。“HUNG CHONG”是老上海著名的外销银器店“鸿昌”,该店原先为洋货号,后来改名为首饰号,为 1884 年广东人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主要销售洋装银器及珠宝首饰等。该店一直开设在南京路,经营半个多世纪,1941 年才关闭。上海“鸿昌”销售的银器,近年来在英、法、美、新加坡等屡屡出现。

银器腹部的英文名字,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Natalin City Bank, Shanghai 不是字面上的“国立上海城市银行”,而是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美

国花旗银行早在 1902 年初就在上海设立分行,1926 年前花旗银行在上海的英文名字是“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shanghai”。1927-1941 年花旗银行在上海的英文名字改为“National City Bank of N. Y”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后面的“N.Y”省略。无论英文名字怎么变,花旗银行的中文名字没变。

银碗的受赠人为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牛惠尔(即杯体上的 R.P. Newell)夫妇。牛惠尔当时为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财务。1939 年 3 月他奉调回美国花旗银行总部工作。杯子是他临行前在花旗银行任职的中国职员赠送给他的礼物。从他保存的另一只比赛银杯来看,牛惠尔 1929 年来到上海,30 年代牛惠尔住在今天淮海路某一公寓内。1939 年因工作出色,牛惠尔离开上海到花旗银行纽约总部任职。为表示对牛惠尔的尊敬和纪念,1939 年 6 月,花旗银行专门设立“牛惠尔”杯乒乓球比赛项目,这一比赛项目是老上海有名的乒乓赛事之一。

为什么说是花旗银行的中国职员赠送给他的礼物呢?杯体上的“Compradore Staff”意思为“买办间职员”。“买办”这个名词,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借用了“买办”这个葡萄牙字,指为领事馆或商行所用当地籍的采买员或使用人的头目。洋行在中国的买办一般都是中国人。花旗银行的买办也不例外。买办主要帮助不熟悉中国的外国公司开展在华业务。上世纪 30-40 年代花旗银行买办主要负责为银行在中国人中拉存款、对银行库存现金进行鉴别,在银行各种票据上盖章作证等。买办还会招聘十来个当地人协助他开展工作,设立买办间。此杯子上的“Compradore Staff”就是指花旗银行买办间职员。花旗银行的买办间当时是吴培初领导下中国人团队。这个团队负责协助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在中国开展业务。1939 年 3 月上海花旗银行会计牛惠尔夫妇带着该行买办间中国职员赠送给他们的银器礼品和美好祝愿回到了美国。

1939 年上海银碗释读 ◆ 胡 宝 芳